

国家治理专题

# 礼治传统与中国式现代化： 基于国家和市场两个维度的分析\*

田野 彭昭男

**内容提要：**中国式现代化既立基于世界现代化的一般性规律，又植根于中国独特的历史传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事业中，传统民本思想在新的历史方位和时代条件下被赋予了新内涵，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礼义。“以人民为中心”的礼义充分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中。官僚制往往被看作国家构建和政治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维度，但存在排斥公众参与、缺乏内部监督等弊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协商民主制度、纪检监察制度和党建引领社区建设，弥补了现代官僚制的不足，有助于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石，市场往往嵌入资本主义体系中，从而成为“资本主导的市场”。经世济民的中国古典思想则使礼治传统和市场体系得以相互嵌入，将党的领导嵌入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中、将民营企业吸纳到政治机构中，有助于构筑“以人民为中心”的市场。礼治传统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一定的价值遵循和行动指南，也为其动态演进提供了基本框架。

**关键词：**礼治传统 中国式现代化 以人民为中心 礼治国家 礼治市场

**作者简介：**田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彭昭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 6649 (2025) 01 - 0015 - 21

---

\* 本文是 2023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现代大国兴衰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研究”（编号：23&ZD038）的阶段成果。

现代化是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构建以来最广为使用的一个概念。无论人们对现代化的具体内涵有多少种不同的认识，现代化的初始涵义都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这样，如何看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就成为现代化理论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之一。相对于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内生的、先发的现代化，非西方国家外源的、后发的现代化更需要面对这一问题。比较现代化研究的主要开拓者西里尔·布莱克强调：“不仅可用西方社会的制度适应于现代化要求，也可以在不同程度上用其他社会的制度来适应这种要求。发展相对滞后的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不是抛弃自己的制度而一味照搬西方各种制度，而是要客观评价自己的制度遗产，并且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对它进行改造以适应现代性的要求。”<sup>①</sup> 这一基于跨国比较的判断对于文明传承在历史上从未中断、在世界浪潮裹挟下步入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来说尤为重要。正如金耀基先生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的：“中国的现代化所意含的不是消极地对传统的巨大摧毁，而是积极地去发掘如何使传统成为获致当代中国目标的发酵剂，也即如何使传统发生正面的功能。”<sup>②</sup>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 40 多年以来探索与实践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做了精确的概括，即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sup>③</sup>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具体的战略部署。中国式现代化既立基于世界现代化的一般性规律，又植根于中国独特的历史传统。本文基于国家和市场的双重维度，探讨中国历史上的礼治传统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 一 从“李普塞特命题”到“摩尔命题”：将历史引入现代化理论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形成时期。随着现代化这一术语

<sup>①</sup> [美] 西里尔·布莱克编，杨豫、陈祖洲译：《比较现代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年，第 6 页。

<sup>②</sup> 金耀基著：《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香港：时报出版公司，1984 年，第 8 页。

<sup>③</sup> 习近平著：《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22 - 23 页。

进入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都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现代化理论。由于社会学、经济学对现代化现象的关注比政治学更早，也由于政治学对社会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依赖很大，行为主义成为这一时期现代化理论研究浪潮的鲜明特征。1959年，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发表《民主的社会前提：经济发展与政治合法性》一文，不再局限于对政党、政府机构或选举过程等政治体系内部因素的分析，而是着重关注经济发展与合法性等政治体系的外部因素对民主制度的影响。<sup>①</sup> 通过大量数据分析，李普塞特对多个初始条件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从而拉开了行为主义范式下政治现代化研究的序幕。自“李普塞特命题”提出后，许多学者都在行为主义范式的指引下，围绕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定量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

虽然行为主义范式主导了这一阶段学界对政治现代化的研究，但巴林顿·摩尔在其1966年出版的著作《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中却强调了历史的作用，并将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发展出一条与行为主义截然不同的研究进路。在摩尔看来，“行为主义的模式严格来讲是错误的。根据这一理论，人与客观环境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中介变量，或者说是滤色镜，这是由各种各样的欲望、期待以及其他来自以往的思想观念所构成的。”<sup>②</sup> 比较历史分析是摩尔现代化理论中采取的主要方法，他希望阐明在农业社会过渡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进程中，土地贵族和农民阶级在政治舞台上饰演的种种角色，“揭示这个或那个农村阶层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从而解释不同形式政权的兴起。<sup>③</sup> 在区分了土地贵族和农民两个阶级的基础上，摩尔采取宏观历史因果推断分析不同国家现代化演进的模式。摩尔由此总结了从前工业社会向现代社会推进的三条历史路线：以英、法、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以德、日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道路；以中、俄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摩尔在分析中还特别强调特定历史情境的作用。例如，他在分析英国的民主化进程时指出，“我们没有必要否认才智焕发的稳健派政治家的历史重要性，但也应看到这些政治家活动身处的历史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另一些同样有才智，但却相当激烈的

<sup>①</sup> Seymour Martin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5, No. 1, 1959, pp. 69-71.

<sup>②③</sup> [美] 巴林顿·摩尔著，拓夫、张东东等译：《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394页，第1页。

人们创造出来的。”<sup>①</sup>

摩尔的比较历史分析将历史因素引入现代化理论。巴雷特·麦科米克认为摩尔的比较历史分析方法为熟悉的问题提供了意想不到的答案，有时还表明公认的答案很可能是错误的。<sup>②</sup> 西达·斯考切波将这部著作称为“关于现代化政治的一部精心编写的马克思主义著作”<sup>③</sup>。就连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代表人物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也肯定了摩尔这项研究的积极价值。他认为，摩尔的研究对于有影响力的定量知识提供了有益的纠正，“他带着读者一起从问题的表述，到材料的评估，到框架的构建，再把它们有序地排列为一组关于现代世界民主和专制起源的命题，避免了现代行为科学的矫揉造作。”<sup>④</sup>

如果“李普塞特命题”意味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二分，那么“摩尔命题”则揭示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纠缠。摩尔对通往现代化社会的三条道路的归纳是从历史和传统出发的分析，回归历史和传统成为“摩尔命题”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重要启示。在考察中国式现代化时，历史视角具有基础地位。“现代化”意味着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过程，而中国式现代化显示出传统与现代之间复杂而紧密的关联。<sup>⑤</sup> 基于“摩尔命题”将历史引入现代化理论的学术源流，本文将聚焦古代中国生发的礼治传统在当代中国的延续，思考这一传统对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

## 二 “以人民为中心”的礼义：礼治传统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

作为一种行为规范，礼可以在秩序建构中发挥类似法律的作用，从而形成了与法治相对的礼治。礼在中国由祭祀的仪节升华为弥散于社会各个组成部分，并结为整体的礼治，经历了独特的文明进程。西周初年，以周公为代表的统治者对殷代的宗教观念进行了重大变革。正是基于“敬德保民”的礼

① [美] 巴林顿·摩尔著，拓夫、张东东等译：《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29页。

② Barrett L. McCormick, “Modernization, Democracy, and Morality: The Work of Barrington Moore, Jr.,”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3, No. 4, 2000, p. 605.

③ Theda Skocpol, “A Critical Review of Barrington Moore’s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in *Politics & Society*, Vol. 4, No. 1, 1973, p. 1.

④ G. Almond,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y Barrington Moore Jr.,”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1, No. 3, 1967, p. 768.

⑤ 应星：《社会学的历史视角与中国式现代化》，载《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第110页。

义，西周统治者发展出一整套礼制，从而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在世界历史上首次建构起礼治秩序。<sup>①</sup> 阎步克以“君、父、师”三者统一于“守礼”的“君子”之中作为类比，指出“众多社会角色业已分化、彼此有别，而又统之于‘君子’，这也正如各种社会事务业已分化、彼此有别，而最终又统之以‘礼’一样”<sup>②</sup>。礼以一种统合原则的形式嵌入古代中国的秩序构建，塑造着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与社会制度结构。

礼治具有两重含义：一是人们对礼制的普遍、主动服从；二是礼制以礼义为宗旨。<sup>③</sup> 在礼的两个组成部分中，礼制是末节，礼义乃根本。《左传·昭公五年》载，鲁昭公访问晋国时行礼如仪，晋大夫女叔齐评价说：“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在女叔齐看来，仪文节式乃是礼之末节，“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才是礼的根本。时人认为女叔齐“知礼”。欧阳修在《新唐书·礼乐志》中也指出：“自汉以来，史官所记事物名数、降登揖让、拜俯伏兴之节，皆有司之事尔，所谓礼之末节也。……习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王国维针对庞杂的周礼，一针见血地指出：“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sup>④</sup>就此而言，礼义是礼治秩序得以形成和维持的基础。

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精华，中国传统治国思想中的很多政治、经济、社会观点和主张都体现了民本取向。<sup>⑤</sup> 《尚书》被认为是古代中国民本思想的源头。《尚书》中提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对后世儒家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黄宗羲提出了“民主君客”的思想：“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sup>⑥</sup>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提出，政府和各种国家制度都应该服务于民众的利益。<sup>⑦</sup> 这些思想在延续了“以民为

① 田野：《礼治与国家建设——将中国元素植入政治秩序理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9期，第54-55页。

② 阎步克著：《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3页。

③ 田野：《礼治与国家建设——将中国元素植入政治秩序理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9期，第53页。

④ 周锡山编校：《王国维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35页。

⑤ 刘学斌：《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当代审视及其转化方式研究》，载《政治学研究》，2023年第4期，第39页。

⑥ 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页。

⑦ 顾炎武著：《日知录（三）》，北京：团结出版社，2022年，第1087-1093页。

本”观念的同时，体现了权力归属从君主到国家的转化。

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现代化事业中，民本思想在新的历史方位和时代条件下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从而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礼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sup>①</sup>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以人民为中心”的礼义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内涵中。

第一，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彰显了以人的逻辑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孟子·尽心下》中提到，“仁也者，人也”。从根本上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找到一条能够承载如此规模人口的新道路。巨大的人口基数使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面临14亿人口的吃饭、住房、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巨大的人口基数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诸多机遇，集中体现在市场规模和人力资源优势。中国式现代化要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蕴含的增长和创新潜力，并将人口更多转化为人力资本。

第二，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突出了人民本位的发展方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孔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本位的发展方向，兼顾效率与公平，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标志着中国在朝着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仍然任重道远。坚持人民本位的发展方向，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也是中国为世界开创的崭新的现代化图景的集中体现。

第三，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契合了人民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多样化需求。《管子·牧民》中提到，“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现代化进程中的物质基础固然重要，但精神文明建设同样是通往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由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协调、共同发展，兼顾人民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是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关切与回应。

<sup>①</sup> 习近平著：《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07页。



第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践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上，中国式现代化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论语》中提到，“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梁惠王》中则提到，“数罟不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在现代化建设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质上是维护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生态文明建设既要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也要不断更新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第五，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顺应了人民追求安全与和平的愿望。西周时期祭公谋父宣扬“耀德不观兵”，春秋时期楚庄王说“止戈为武”。儒家崇尚“仁政”和“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从本质上说，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和平发展的强调既为自身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保障了人民的安全，也为中国同其他国家开展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奠定了坚实基础，增进了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因此，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既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总而言之，“以人民为中心”的礼义全面反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之中，为推进和扩展中国式现代化锚定了基本方向。作为发挥统合作用的礼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形塑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建设，由此产生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中的主要礼制。现代国家建设和现代市场经济分别是政治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最重要的标尺。如马克斯·韦伯宣称：“正如所谓向资本主义进步就是衡量中世纪以来经济现代化的确凿标准一样，向官僚制官员进步则是同样确凿的衡量国家现代化的标准。”<sup>①</sup> 鉴于此，下面分别探讨传统礼治对现代国家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嵌入，也就是礼治国家和礼治市场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体现。

### 三 超越官僚制：礼治国家与中国式现代化

在礼治国家的构架下，礼治和现代国家作为两种基本制度相互嵌入，使中国政治发展在这两个要件之间实现了彼此的平衡。<sup>②</sup> 礼治国家自东汉在中国定型后，成为中国两千年来主导国家形态。近代以来，经过西方入侵和全球化

<sup>①</sup> [德] 马克斯·韦伯著，阎克文译：《经济与社会》（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61页。

<sup>②</sup> 田野：《礼治与国家建设——将中国元素植入政治秩序理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9期，第67页。

的冲击后，礼治国家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在中国延续下来。作为其表现形式，宏观层次的协商民主制度和纪检监察制度及微观层次的党建引领社区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弥补了现代官僚制的不足，有助于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

### （一）对官僚制国家的超越：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

从世界范围上看，现代官僚制的形成与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诞生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威廉·麦克尼尔对18世纪、19世纪欧洲军队的研究表明，欧洲国家的君主推动了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官僚化并将这一体制深植于市民社会之中，使其成为支配欧洲国家的管理模式。这使得“欧洲人在与地球上其他民族的冲突中总是取得胜利”<sup>①</sup>。查尔斯·蒂利明确提出了“战争缔造国家”的观点，认为战争对于国家建构和官僚制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指出，1789—1815年间的法国提供了一个“供其他国家模仿的中央集权的模式”，并在法国征服的任何地方推行该模式的变种，在欧洲大陆实现了从间接统治向直接统治的转变。<sup>②</sup>在现代化理论中，官僚制已经成为国家构建和政治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维度。

马克斯·韦伯从法理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出发，对官僚制这一统治形式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在韦伯看来，官僚制是“把社会行动改造为有理性的特定手段”，是“官僚机器控制者头等重要的权力工具”<sup>③</sup>。从组织原则上看，官僚制具有严密的等级制以及专业化、非人格化等特征，是一部运转精密的工业化机器。但在实践运行中，现代官僚制并非是“完美无缺”的，而是存在着一定的弊端。作为一种组织形式，现代官僚制本质上是一种“官本位”，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会产生某种自主化倾向，这种对于权力地位的追求使其超出了自身原有的工具价值。一方面，为了维持自身的优势权力地位，官僚制行政总是倾向于排斥公众，尽可能隐蔽它的信息，避免其不良行动遭受批评。这种纯权力关切所产生的影响会大大超出这些受功能性保密动机驱使的领域。<sup>④</sup>这使得官僚制的发展与现代民主之间产生了潜在的矛盾关系。另一方面，官僚制在等级制职务权威的原则下形成“高级职务监督低级职务的上下级隶属体系”<sup>⑤</sup>。这种

① [美] 威廉·麦克尼尔著，孙岳译：《竞逐富强：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与社会》，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年，第128页。

② [美] 查尔斯·蒂利著，魏洪钟译：《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9页。

③④⑤ [德] 马克斯·韦伯著，阎克文译：《经济与社会》（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127页，第1132页，第1096页。



结构的存在使得行政机构本身缺乏足够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官僚制所提出的核心政治问题是如何将它限制在适当的职能范围之内，如何保证官僚对行政效率和权力的关注确实从属于政治家的职能，而政治家的职能在于界定这一权力服务的目标以及对这些目标负责。<sup>①</sup>由此可见，韦伯意义上的官僚制国家在组织形式和行政方式上既有优势和可取之处，也有一些有待于修正或变革的部分。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韦伯式国家”的概念开始在西方学界兴起，其核心特征在于推动政府从实现以官僚规则为主的内部导向转向满足公民需求和愿望的外部导向；在坚持代议制民主的基础上，注重通过同公民协商等手段实现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在政府内部资源管理方面注重结果导向；推动公共服务的专业化。<sup>②</sup>西方学界对于“新韦伯式国家”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是对于现代官僚制的修正，旨在克服或减弱官僚制的不足。

尽管现代世界大多数区域的官僚制来自对欧洲国家制度的模仿与学习，但中国的官僚制有自己的起源。中国官僚制的出现至迟可追溯到西周，在西周中期时，王畿内部已依靠规模有限的官僚机构进行管理。<sup>③</sup>在战国烽火中，秦国最为有效和成功地缔造了自上而下的官僚机构。在福山看来，对照韦伯所定义的现代国家特征，“秦朝如果没有全部，至少也有很多”，之后“西汉的中国政府几乎符合现代官僚机构的全部特征”<sup>④</sup>。因此，中国两千多年前就出现了现代官僚制，但中国的国家形态并未定形于此，走上了礼治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从秦的“文吏政治”、西汉的“霸王道杂之”、王莽“奉天法古”的改制到东汉的“儒法合流”，礼治和国家建设作为政治秩序的两个构件在中国实现了彼此平衡，礼治国家作为一种混合的政治秩序走向定型。<sup>⑤</sup>阎步克将这种混合的政治秩序称为“礼法秩序”，认为这是帝国政治文化形态可能达到的“稳态”，是在传统所提供的资源范围之内能够得到的相对较具适应性的演化结果。它延长了各个王朝的寿命，并且保证了中华帝国在一次次解体

① [英]戴维·毕瑟姆著，徐鸿宾等译：《马克斯·韦伯与现代政治理论》，吉林：吉林出版集团，2015年，第80页。

② Christopher Pollitt and Geert Bouckaert, *Public Management Refor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18 - 119.

③ 李峰著：《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98 - 300页。

④ [美]弗朗西斯·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3页、第131页。

⑤ 田野：《礼治与国家建设——将中国元素植入政治秩序理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9期，第61页。

之后，又一次次地以类似形态重新建构起来。<sup>①</sup> 赵鼎新将这种形态的国家称为“儒法国家”，认为官僚制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帝制儒学的基础之上，这种国家形态在为国家提供合法性的同时，也为整个社会提供了道德标准。此外，作为一种“官僚体制意识形态”的帝制儒学一定程度上能减缓由官僚体制的内在缺陷引发的种种问题，避免这些问题在体制内部滋生与恶化。<sup>②</sup>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韦伯一方面看到了中国早已出现高度发展的官僚制，另一方面从官僚制的“理想类型”出发，认为中国官僚制的理性化程度不足。在韦伯眼中，中国是个“巫术的乐园”，中国人重视“孝”与“礼”，但大多沦为形式主义。<sup>③</sup> 韦伯注意到礼在中国政治秩序中的核心地位，但他更多地看到了礼的形式规范层次，而较少注意到礼背后的伦理性情感。<sup>④</sup> 正是礼治国家这一中国式的国家形态，将官僚制与礼治相互嵌入，虽然限制了官僚制的理性化程度，但也有助于克服官僚制本身的一些问题。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当代中国国家建设在“以人民为中心”这一礼义的指导下，避免理性官僚制向“官本位”片面发展，努力革除官僚制存在的弊端，从而实现了对官僚制国家的超越。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礼义，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礼制从形式上至少包括协商民主制度和纪检监察制度两个重要方面。其中，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保障了人民的政治参与，能够有效防止官僚制行政排斥公众参与的现象；而纪检监察制度则有效弥补了现代官僚制缺乏内部监督的弊端，通过自我监督确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干部队伍始终为人民服务。此外，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延伸，通过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礼治传统也深度融入社区治理，修正了官僚制“自上而下”的治理逻辑。

## （二）以协商民主制度保障人民政治参与

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协商传统。《周礼·小司寇》中载“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体现了“万民”能够通过协商的方式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尚书·洪范》中“汝则有六事，一曰谋及乃心，二曰谋及卿士，三曰谋及庶人，四曰谋及卜筮。汝则从、龟

<sup>①</sup> 阎步克著：《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94页。

<sup>②</sup> 赵鼎新著，徐峰、巨桐译：《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332页。

<sup>③</sup> [德] 马克斯·韦伯著，康乐、简美惠译：《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7页。

<sup>④</sup> 李荣山：《文明比较与文化自觉：迈向和而不同的比较历史社会学》，载《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第177页。

从、箠从、卿士从、庶民从，是谓之大同”，则反映了当时的王在决策时需要将多方意见纳入考量之中，并对多方意见进行综合性评估。经过几千年的演化，中国传统政治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多层次的协商系统：核心层是国家政治制度中的协商，如朝议、谏议、经筵；中间层相当于哈贝马斯的弱公共领域的协商，如学校、书院、会馆；外层则是以大众舆论形态存在的协商，如祠堂。士大夫阶层将这三个层次的协商机制有机衔接起来。<sup>①</sup>

如果说中国传统协商政治的对象限于士大夫阶层，那么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则将范围扩大到包含各阶层的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立和发展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把“以人民为中心”的礼义充分融入协商民主实践，以协商民主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在制度设计的价值内核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继承了“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的传统思想，充分体现了“人民本位”和“人民至上”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人民内部各方面广泛商量的过程，就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这样做起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才能具有深厚基础，也才能凝聚起强大力量。”<sup>②</sup> 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礼义的指导下发展协商民主制度体系，成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进路。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内生于中国民主的实践，并呈现出自己独特的诞生方式：以政党为主角，直接在政权组织与运行层面展开。<sup>③</sup>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保障人民有序参与政治生活，寻找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协商民主是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设计，同选举民主相互补充、相得益彰。”<sup>④</sup> 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通过多种形式的协商，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广泛接受批评和监督，可以广泛达成决策和工作的最大共识，有效克服党派和利益集团为自己的利益相互竞争甚至相互倾轧的弊端。<sup>⑤</sup>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

<sup>①</sup> 谈火生著：《文明互鉴与民主想象的更新：中西协商思想探源》，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Ⅶ页。

<sup>②</sup>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73-74页。

<sup>③</sup> 林尚立、赵宇峰著：《中国协商民主的逻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0页。

<sup>④</sup>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207页。

<sup>⑤</sup>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76页。

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sup>①</sup>。当前，中国已经形成了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多层协商渠道，为人民内部各方面“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提供了制度支持。在党的领导下建设多层协商民主体系，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充分实现了党的群众路线与协商民主制度体系建设的有机结合。

### （三）以纪检监察制度实现国家自我监督

不同于立法、行政、司法等机关，纪检监察机关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质的国家机关。塞缪尔·芬纳在其三卷本的巨著《统治史》中将使政府自我批评得以机制化的监察制度看作古代中国为世界文明提供的一项政治制度创新。<sup>②</sup>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由谏官制度、御史制度及封驳制度三大体系组成。<sup>③</sup>春秋战国时期官僚制的形成为监察制度的形成奠定了组织基础。<sup>④</sup>唐代建立了一台三院的监察体制，即御史台及台院、殿院和察院，监察机关发展为独立的系统，形成了严密的网络。<sup>⑤</sup>宋代士大夫通过御史台、谏院即所谓“台谏”规谏君主和监督宰相，成为对君权、相权的重要制约。明初君主专制空前加强后，对监察体制实行了重大变革，罢御史台，置都察院，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古代中国监察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权力制约的考量，但其根本目的仍然是维护君主制度。高一涵认为，“大概只要是专制政治，万全总是自上而下的，绝不许有自下而上的监督权发生……凡是君治的国家，总只许君主一人有监督内外百官的大权，故治事之官少，治官之官多。”<sup>⑥</sup>

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纪检监察制度在继承古代中国监察制度遗产的同时，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礼义下，将维护人民利益作为其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守纪检监察工作人民立场”，实现了对古代中国以维护专制统治为目标的监察制度的重大修正。纪检监察监督是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及派驻（出）机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机关及派驻（出）机构依纪依法对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行使权力的情况进行的监督。<sup>⑦</sup>基于

①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28页。

② [美]塞缪尔·E.芬纳著，王震译：《统治史（卷二）：中世纪的帝国统治和代议制的兴起——从拜占庭到威尼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8页。

③ 贾玉英著：《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页。

④⑤ 张晋藩著：《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史》，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3年，第18页，第142页。

⑥ 高一涵著：《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72页。

⑦ 高委主编：《纪检监察监督问题研究》，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第3页。

“以人民为中心”的礼义，纪检监察工作的目的是“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sup>①</sup>。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内容，纪检监察工作是党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主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sup>②</sup>除了反腐倡廉工作，纪检监察机关通过专责监督落实中央部署的其他重点，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保驾护航，为人民根本利益提供纪律保障。

从性质上说，纪检监察监督是党和国家的自我监督。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强调，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sup>③</sup>因此，中国特色的纪检监察制度能否破解这一世界性难题，对政治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当前，中国共产党把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作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首先，通过构建更加完善、系统的纪检监察体系，推动对政府部门、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的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机制化、常态化，提升纪检监察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其次，积极探索贯通纪委监委体制与民主监督，做到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的内在统一，将自上而下的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监督结合起来，从而夯实党内监督的群众基础。最后，时刻保障纪检监察机关干部队伍的纯洁性，通过自我监督、党内监督和社会监督，努力建设一支让党放心、人民信赖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 （四）以党建引领社区建设

在“仁者爱人”的思想基础上，儒家特别重视社群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荀子·王制》中论述了良好的社群治理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故人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为了把握发生在帝制时期中国政府与民间社会的中间领域的治理方法，黄宗智提出了“集权的简约治理”概念。<sup>④</sup>杜赞奇用“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形容20世纪前半期中国国家政权的扩张过程，他认为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

<sup>①②</sup>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7页，第66-67页。

<sup>③</sup>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98页。

<sup>④</sup> 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载《开放时代》，2008年第2期，第20-25页。



与社会关系来扩大其行政职能，力图发展一种不受精英操控的基层权力机构，但最终却阻碍了国家政权的真正扩张。<sup>①</sup>李怀印用“实体治理”来刻画县级以下地方行政中非正式做法的流行：在这里国家和社群共同参与，官方职能与地方制度安排交织在一起；国家的首要目标是在不危及地方稳定的前提下，确保社会治安的维持和国家财政需求的满足。<sup>②</sup>近年来，既有理论围绕帝制时期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程度展开了许多讨论，形成了“乡村自治”“吏民社会”“官民合作”等假说。<sup>③</sup>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单元，是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场域。社区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在社区这个新生城市社会空间的自然延伸，并非完全由社区内生性需求驱动而成，这就决定了其天然同国家治理体系高度“链合”在一起。<sup>④</sup>社区治理的制度体系构建并非完全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而是将礼治传统深度融入。通过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中国城市社区已经形成了以党民融合为特征的治理格局。这种治理模式既是对“国家—社会”二元模式的超越，也是对官僚制“自上而下”治理逻辑的重要修正。

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礼义，党建引领的社区治理的最终指向是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社区治理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党建引领的社区治理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需求，为人民群众提供稳定的社区秩序。社区秩序是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秩序，直接关系到居民在社区中的居住与生活品质，往往与社区中频繁发生的日常性小事有关。<sup>⑤</sup>基层党组织对社区建设的引领，能够直接触及影响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各类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群众安全。

从制度形式上看，党建引领的社区治理是一种非正式的协同性治理。一方面，以社区治理为代表的基层治理需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要抓紧补齐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的各种短板，把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实现党

① [美] 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6—67页。

② 李怀印著：《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5—16页。

③ 周黎安：《“一体多面”：中华帝制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再研究》，载《社会》，2022年第5期，第3—5页。

④⑤ 王德福著：《中国式社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276页，第279页。

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sup>①</sup> 基层党组织的引领能够把握社区治理的基本方向，并根据实际情况实现社区治理资源的合理配置。另一方面，社区治理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调动业主委员会等社会自治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积极性。但业主自治经常面临组织困境，比如业委会成立难、业主自治决策困境和业主自治组织架构缺陷等。<sup>②</sup> 面对这些自治困境，需要基层党组织发挥协同作用。基层党组织与社会自治组织之间的协同治理体系能够及时回应社会内生性需求，更充分地保障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 四 超越资本：礼治市场与中国式现代化

任何现实的经济运行都是嵌入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的，没有能够脱嵌的、仅在理论上存在的纯粹经济运行。<sup>③</sup> 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石，市场往往嵌入资本主义体系中，从而成为“资本主导的市场”。但市场也可以嵌入其他政治和社会结构中。在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内，经济被理解为公共事务，与古希腊色诺芬将经济界定为家庭事务截然不同。<sup>④</sup> 中国古代经世济民的思想使礼治传统和市场体系得以相互嵌入，有助于构筑“以人民为中心”的市场。

##### （一）对“资本主导的市场”的超越：构筑“以人民为中心”的市场

市场组织背后的理念与方法不仅关系到市场，而且关系到市场与其他因素（如政治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sup>⑤</sup>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由资本主导的市场在经济体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私人资本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者，政府只进行最低程度的干预。资本主导的市场具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资本无限增殖和扩张的逻辑。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sup>⑥</sup>。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家对于剩余价值的追求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另一方面产生

①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599页。

② 王德福著：《中国式社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100-103页。

③ 李培林：《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发展社会学》，载《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第19页。

④ 赵可金：《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及其贡献》，载《拉丁美洲研究》，2023年第6期，第14页。

⑤ 郑永年、黄彦杰著：《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74页。

⑥ [德]卡尔·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14页。

并加剧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积累的本性，决不允许劳动剥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劳动价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严重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sup>①</sup> 二是资本的增殖和扩张产生的消极社会结果，包括资本对人的异化和对社会的毁灭性影响。卡尔·波兰尼指出了市场被资本彻底主导可能产生的可怕后果：如果允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的命运、人的自然环境，或者哪怕是他的购买力数量和用途的唯一主宰，那么它就会导致社会的毁灭。<sup>②</sup> 波兰尼提出经济自由主义和社会保护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运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是对“社会组织中的人性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威胁”<sup>③</sup>。

20 世纪 80 年代初，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推崇市场原教旨主义。80 年代后期，拉美国家普遍推行了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经济改革。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后，东欧以及前苏联国家在国内实施了“休克疗法”。东欧和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共同点是全面的私有化，同时否定政府干预的作用。这种“资本主导的市场”的形成和扩张加剧了这些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同时缺乏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只是“少数人的现代化”。亚当·普沃斯基指出，“资本主义是不合理的，因为它不能实现技术上可行的福利分配机制。我们可能拥有能够养活地球上每一个人的技术和组织手段……然而，我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仍做不到这一点。”<sup>④</sup>

面对新自由主义浪潮，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动摇，通过政府“看得见的手”去引导市场“看不见的手”更好地发挥配置资源的功能。如乔万尼·阿里吉观察到，中国经济改革中推行的相对渐进主义，以及中国政府为促进市场扩大与新社会分工之间的协调而采取的应对行动，都表明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市场乌托邦”式信仰对中国改革者来说是格格不入的。<sup>⑤</sup> 在市场组织方式的理念与方法上，中国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① [德] 卡尔·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716 页。

②③ [英] 卡尔·波兰尼著，冯钢、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 年，第 74 页，第 157 页。

④ [美] 亚当·普沃斯基著，包雅钧等译：《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82 页。

⑤ [意] 乔万尼·阿里吉著，路爱国等译：《亚当·斯密在北京：21 世纪的谱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第 361 页。

通过有为政府推动有效市场的发展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是中国推动的“礼治市场”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差别，也是“礼治市场”对“资本主导的市场”的超越。

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国家对经济进行必要干预的传统。儒家思想不赞成国家与民争利，比如孔子认为“天子不言有无，诸侯不言多少，禄食之家，不与百姓争利”。让利于民是食禄者不言利原则的基本思想，其目的旨在保护弱者、抵制强者。<sup>①</sup>但是，国家如果为民兴利除害，保护弱者，也可以干预经济。《管子·治国》中指出了支持农业发展对于治国理政的重要意义。“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管子·国蓄》中提到君主需要控制货币的流通和商品供求关系，反映了朴素的货币理论。“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汉宣帝时期，耿寿昌建议官府在边郡设置谷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贵而粜，名曰常平仓。”<sup>②</sup>粮食价格受到各种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因此常平仓制度的出现对于调控粮价、保护民众利益和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价值。此外，古代中国的政府还通过被称为“泉府”的政府银行为民众提供赊欠与贷款。对于民众必需的消费，如祭祀或丧纪，政府无利息要求；但对于生产资本，则要求还息。“泉府”借贷给民众的目的不是为了税收，而是为了民众的利益。<sup>③</sup>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要推动“礼治市场”的建设和发展，既要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又要充分激发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活力。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礼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两个重要礼制，即将党的领导嵌入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中和将民营企业吸纳到政治机构中。

## （二）将党的领导嵌入国有企业治理结构

中国很早就开始了国家专营的实践。《管子·山海》中记载了齐桓公与管仲之间的对话“桓公曰：‘然则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为可耳’”，这是有关国家专营思想的最早阐述。管子所说的“官山海”就是国家依靠控制

<sup>①②③</sup> 陈焕章著，韩华译：《孔门理财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24-426页，第447页，第460页。

盐铁等资源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令盐之重升加分强，釜五十也；升加一强，釜百也；升加二强，釜二百也”。汉武帝实行了盐铁业的国家垄断，财政部门控制了盐铁业的生产设施并将其转变为国有企业。<sup>①</sup>宋代实行国家盐业专营，一度还实行了国家茶叶专营。古代中国的国家专营制度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能起到抑制私营工商业从而巩固中央集权的作用。<sup>②</sup>但这一制度本质上是為了“富国”而非“裕民”，因此很容易发展为“敛财”，从而加重人民的负担。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有企业承载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国有部门不仅要为国家创造收入，还要在保持整个经济体系健康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如平衡其他经济部门，建设私营部门无法解决的重要经济基础设施，以及应对经济危机。<sup>③</sup>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关系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巩固，关系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sup>④</sup>因此，如何更好地发挥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是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市场”的关键一环。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了一些国有企业仍然存在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包括一些企业管理混乱，内部人控制、利益输送、国有资产流失、企业办社会职能和历史遗留问题还未完全解决等。<sup>⑤</sup>由此可见，委托—代理问题成为国企改革进程中需要妥善应对的核心问题。对于一些大型国企来说，在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的情况下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所有者和经营者的激励不同造成的激励不相容；二是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道德风险。<sup>⑥</sup>由于国有经济的代理人往往有自己的利益，他们获取经济资源和权力并将其作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因此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使得国有部门很容易偏离国家利益。<sup>⑦</sup>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人民性，让国有企业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而非少数人的利益。

把党的领导嵌入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中是国企改革进程中解决委托—代理

①② [美] 万志英著，崔传刚译：《剑桥中国经济史：古代到19世纪》，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97页，第197页。

③ 郑永年、黄彦杰著：《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35页。

④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92页，第648页。

⑥ 林毅夫著：《中国经济专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0-161页。

⑦ 郑永年、黄彦杰著：《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35页。



问题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明确和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做到组织落实、干部到位、职责明确、监督严格。”<sup>①</sup> 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全体人民的利益，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因此将党组织嵌入国企治理体系能够强化委托—代理结构中“所有者”的地位，防止国有企业被私人利益所主导而变成“国有私产”，从而切实保障人民利益的实现。

### （三）对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吸纳

春秋时期，由于西周“工商食官”制度的松动与削弱，私营专职商人的数量空前增多，由此产生了古代中国的商人阶级。商人和商业资本在战国秦汉时期得到迅速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步入低谷，在隋唐之后又重新复苏。<sup>②</sup> 虽然中国历代王朝大都推行了“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但在不同历史时期私营资本的力量和地位有所不同。“政府对商人既有抑制、打击，又有扶持、勾结。两者之中，孰多孰少，在不同朝代或同一朝代的不同时期，颇为不同。”<sup>③</sup> 在一些时期，“抑商”政策只不过是空泛的政治口号。即便如此，“重商”大多体现在大商贾以及官僚贵族的商业活动中，对于中小商人来说，虽然其经营活动得到政府表面上的支持，但其利益仍未得到充分保证。<sup>④</sup> 对此，李剑农先生指出：“普通商人之活动大都必隐庇于贵族权豪之下，否则其资货可立毁……反之，商人若能与权贵官僚发生亲善关系，则不惟受压迫之危险，且可得其周密之卫护。”<sup>⑤</sup> 宋代虽然形成了商业行会等旨在维护商人利益的组织，但往往被政府用作剥削广大商人的工具，使得中小商人无法充分保护自身利益。<sup>⑥</sup> 因此，商人的利益能否得到保护，在中国历代王朝都要看政府的政策取向。

在当代中国，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构筑“以人民为中心”的市场，国家一方面要充分保障民营企业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及营商环境，激发民营企业的市场活力，另一方面要避免民营企业将政府“俘获”，避免资本无序扩张。党的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

① 《习近平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党对国企的领导不动摇》，新华网，2016年11月19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0/11/c\_1119697415.htm. [2024-09-21]

②③ 姜锡东著：《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1-23页，第365页。

④⑤ 李剑农著：《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第二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04页，第112页。

⑥ 姜锡东著：《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60-361页。

为党的长期指导思想写入党章，是国家民营经济政策走向制度化的重要节点。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sup>①</sup> 美国学者蔡欣怡观察认为，中国正式制度——即官方的国家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巨大改革强化了私营经济的政治合法性和经济安全性。<sup>②</sup>

随着正式制度的变革，将民营企业吸纳进政治机构成为积极健康的市场—国家纽带上的非正式制度。吸收民营企业入党是这一制度构建的关键节点。“要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sup>③</sup>，这标志着党对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肯定。中国共产党通过党的统一战线来实现与新兴社会阶层的团结合作。<sup>④</sup> 国家吸纳民营企业家的制度结构包含三个层次，从外围到中心分别是工商联、人民政协和人民代表大会。<sup>⑤</sup> 通过上述渠道，国家将资产和生产水平超过特定规模的民营企业家纳入政治体系。<sup>⑥</sup> 郑永年对此评价道：“与政治动员和社会混乱的不确定未来相比，当前的吸纳制度的确符合私营企业家的利益，特别是大企业的利益，以至于他们觉得自己与社会和政治稳定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sup>⑦</sup> 在这种制度化的吸纳模式下，中央和地方政府能够为民营企业提供一定的激励，创造相对稳定的发展预期，从而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

## 五 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它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进程，而且改变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作为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开创者，罗荣渠先生基于其“一元多线”的历史观，展示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

①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9页。

② [美] 蔡欣怡著，黄涛、何大明译：《绕过民主：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的身份与策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页。

③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1页。

④ 黄金辉、魏倩：《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吸纳与整合研究》，载《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第32页。

⑤⑥⑦ 郑永年、黄彦杰著：《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88-289页，第296页。

三次高潮。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上半叶是第一次高潮，中心区在西欧。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是第二次高潮，中心区扩大到东欧、北美和拉美部分地区。这两次高潮的中心区都属于基督教文明圈。在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第三次高潮中，中心区却转移到与基督教文明很少联系的东亚，而不是在接近基督教文明的西亚地区，也不是在接受过西方统治的南亚地区。罗荣渠先生猜想，现代化的扩散与文化圈之间可能有某种关系；儒家文明可能比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更容易接受现代化。<sup>①</sup> 本文的讨论表明，中国的礼治传统和中国共产党推进的现代化具有相当的契合性，礼治传统经过一定程度上的改造可以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西周开创了礼治传统，为世界政治文明提供了新的制度选择。这一传统在之后的三千年中，历经“周秦之变”“五胡乱华”“唐宋变革”“宋元变革”等大变局，在中国仍绵延不绝。“尽管有20世纪早期的巨大破坏，王朝中国和今天中国共产党主持的政治体，相互之间还是有很大连续性。”<sup>②</sup> 在中国共产党推进和拓展的中国式现代化事业中，礼治传统已被证明可以用来达成现代化的目标。“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礼义基础，超越官僚制的礼治国家和超越资本的礼治市场则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具体的制度，包括协商民主制度、纪检监察制度、党建引领社区建设、将党的领导嵌入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和对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吸纳机制等。这些制度如果置于源自西方的法治秩序或宪政秩序中，其结构和功能将很难理解，但如果置于源自中国的礼治秩序中，就可以将其看作礼制的某种形态。基于礼义和礼制在礼治秩序中的相对地位，“以人民为中心”的礼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价值遵循，而具体的制度紧紧围绕着“以人民为中心”的礼义而确立和运行，构成在相关领域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行动指南。当具体的制度在功能和效益上存在不足时，需要通过改革的方式对其加以优化，“以人民为中心”的礼义是深化改革的核心原则。就此而言，礼治传统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一定的价值遵循和行动指南，也为其动态的演进提供了基本框架。礼治传统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将为世界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做出重要贡献。

（责任编辑 徐 睿）

<sup>①</sup> 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75页。

<sup>②</sup> [美] 弗朗西斯·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25页。